

以人为本、以媒为桥， 探寻基础医学叙事路径

——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实践与思考

郭 凯¹ 李 媛^{2*}

(西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教研室, 泸州 646000)¹

(昆明理工大学科学技术院, 昆明 650500)²

[摘 要] 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正蓬勃发展, 但相比于临床医学, 基础医学科普创作较稀缺, 这与基础医学在医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科普潜力不相称,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的长远发展。本文陈述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现状, 比较当前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新媒体科普创作的差异, 总结出新媒体基础与临床医学科普创作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作者结合自身和他人的创作经验, 基于“以媒为桥, 优化科普创作的叙事路径; 以人为本, 塑造青年受众与创作者的双重角色”两个理念, 从叙事路径中探索新媒体时代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发展策略。最后, 探讨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发展的制约因素, 提出激活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原动力的有益建议。

[关键词] 基础医学 新媒体科普 实践与思考 叙事路径

[中图分类号] G315; R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957/j.cnki.kpczpl.2023.03.007

一、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现状

(一) 政策引导和受众需求

2016 年,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2022 年, 由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出要“构建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 鼓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促进与健

康教育”。近年来, 在国内新媒体科普创作中, 医学类科普创作日趋活跃, 为提升公民科学与健康素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国内主流科普类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为例, 据喻倩 2021 年对平台推文的抽样调查显示, 与健康话题相关的文章占比达 27.5%, 在科普类文章中比例最高^[1]。张敏 2021 年对抖音平台受众的问卷调查显示, 在受众观看的科普短视频种类中, 健康医疗类占比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互联网+’条件下探索以新媒体医学科普推进医科大学生学习方式创新”(DSJ2022182)、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背景下科研成果向科普资源转化的研究”(2017ZZX150)。

*通信作者: 李媛, 昆明理工大学科学技术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与管理。lily@kust.edu.cn。

最高，达73.9%^[2]。可见，以健康话题为主要内容的医学科普借助新媒体传播途径蓬勃发展，并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泛知识化的“大健康、大科普”传播趋势。

（二）创作队伍

医学类新媒体科普创作队伍整体壮大。以抖音平台为例，2023年4月7日，抖音发布的《抖音健康科普数据报告》显示，抖音平台认证医生已达3.5万，所分布的最热门5个科室是内分泌科、心脑血管科、皮肤病科、骨科、呼吸科，搜索率排在前5位的疾病分别是肺炎、感冒、糖尿病、痔疮、鼻炎。

除了个人之外，不少医院也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科普创作。例如，以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医院均在新媒体平台上发表科普文章、图文漫画、科普视频等作品，形成新媒体矩阵式科普传播方式，打造出有特色的科普品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3-5]。此外，一些媒体也在新媒体医学科普栏目或账号建设上有所布局，如腾讯的“腾讯医典”等。

然而，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者的单位类型、学科分布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同样在抖音平台上，根据灰豚数据检索显示，分别以“基础医学”及“基础医学”所包含的二级学科“细胞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为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播主分别为5、8、10、13、23个，均来自教育系统、科研机构或专业学会，其中粉丝上万的播主只有1个（蒋老师不会教生物），无论与基础医学科普播主还是与医生播主相比，数量都相差悬殊。相关情况显示，当前的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的主体以医院中的临

床医学从业人员为主，医科院校、科研机构中的基础医学从业人员相对缺失。

（三）形式与内容

新媒体医学类科普创作的形式趋向多元化，以科普短视频、音频、文章、漫画为主。短视频方面，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急诊外科医生高巍所创立的抖音账号“医路向前巍子”，通过客观传播健康知识的全知视角和主观叙述亲身经历的内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搭建起医学科普创作者与社会受众的情感桥梁，成为医学科普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抖音号之一^[6]。短篇图文方面，“腾讯医典”以诙谐幽默的形象、图文并茂的表达形式传播医学健康知识，受到了大众的喜爱^[7]；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李鸿政所创立的微信公众号“听李医生说”，则以叙事医学的方式进行有故事、有温度的案例式科普，在传播医学知识的同时，展示了科普作品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作用^[8]。科普漫画方面，有由北京天坛医院的缪中荣医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何义舟医生联合创立的“小大夫漫画”，还有科普漫画“混知”系列的分支——医学科普漫画“混知健康”，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均在网络传播之后又结集出版。

从内容分布来看，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多集中于疾病的预防和救治、药物使用、健康保健、医学案例等临床领域，重视回应公众就医用药、日常保健时关心的问题，但对基础医学、医学领域前沿研究、医学人物等的关注较为不足。综合内容分布与内容质量，目前的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第一，创作题材同质化，内容枯燥单调，或缺乏对科学隐喻的解构和重构；第二，科普作品铸魂不够，缺乏人文、思政元素的深度思考，或文理不交融；第三，科

普作品科学内涵缺失，或阐释力度不够，缺乏基础理论支撑；第四，反映前沿交叉领域医学科技进展，且内容吸引人的科普作品匮乏。发展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发挥基础医学学科的优势，破解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中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发展的不平衡、不均衡，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上述情况。

二、基础医学——新媒体科普创作的薄弱环节

（一）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科普创作的差异

基础医学，是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本质及其规律的自然科学，是其他所有应用医学的基础。而临床医学，以研究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后，提高临床治疗水平为主要内容，是偏应用与实践的医学科学。在整个医学门类下，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同为一级学科，前者侧重基础研究，后者侧重临床应用，都是医学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学科内容上，基础医学涵盖了多个医学与自然科学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二级学科，例如医学细胞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生理学、医学遗传学、医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化学、药理学、人体解剖学、法医学等。临床医学则按照医学中的实践活动和诊疗方向划分为多个二级学科，例如急诊医学、麻醉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外科学、内科学、儿科学、老年医学、妇产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肿瘤学等。

在科普创作中，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作品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前者重知识轻机理，叙事路径较为单一，但应用指导性、可操作性强，受众一般有健康养生、疾病诊疗等实用性医学需求；后者重在阐释健康疾病背后的机理，叙

事路径多元化，强调知识的深入浅出，以及内容的可读性、趣味性、思想性，受众一般为具有一定知识储备、有深度科普需求的人群或对医学科学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因此，当前以临床医学为主流的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可以通过发展和繁荣基础医学创作来补齐短板，提升质量。以“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为例，围绕着“衰老”这一主题，截至2023年9月，平台一共发表了53篇科普文章，其中47篇内容以预防、延缓衰老的生活保健为主要内容，6篇文章以衰老的认知、发生机制，以及前沿研究进展为主要内容。前者代表性文章《警惕！过了这个年龄会瞬间“变老”！这4个衰老信号千万别忽略》侧重于临床医学科普创作方式，文章客观阐述了衰老发生的年龄，衰老对身体的影响，为应对衰老应该如何保健，事实明确，条理清晰，满足了受众对“衰老”相关应用性知识的需求。但没有进一步阐释“衰老”的生理病理机制，以及如何从医学伦理上审视“衰老”，“衰老”在生命中的意义等问题。后者代表性文章是韩启德院士发表的《衰老是什么？》，文章满足了深度科普的需求，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既有衰老发生的机理阐释，又有关于衰老的人文关怀，更有衰老价值的哲学思考，体现了基础医学特色的科普创作方式。总而言之，医学科普创作要实现从传授医学科学知识到提升受众医学健康素养的跨越，基础医学创作的繁荣不可或缺。

（二）制约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关键问题

当前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确实呈现“临床热、基础冷”的局面，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亟须发展。但无论是人员层面还是内容层面，都面临着不少困难。对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

精准分析，才能找到突破的方向。笔者根据自身科普创作经验及观察、调查所得，认为目前存在三个制约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发展的关键问题。

1. 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者积极性不足

创作源动力不足对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长远发展存在很大的制约作用。尽管新媒体科普创作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在医科院校中，从学校和院系层面上看，部分高校更重视科研和教学业绩对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而对科普与科研、教育同向而行，协同推动学校发展的认识不足。从个人层面来看，部分基础医学专业教师尽管对新媒体科普创作有兴趣和热情，但由于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与科研、教学成果有更紧密的挂钩，使得部分教师在已承担大量科研、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对科普创作积极性不高。考虑到新媒体科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需要构建科普品牌效应，保证优质科普作品的持续稳定产出，形成用户黏性，以上问题不利于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繁荣发展。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部分学校 and 在校师生以割裂的方式看待科普与科研、教学的关系，认为科普在促进科研和教学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有可无。激活新媒体科普创作的原动力，需做到以科普为桥，衔接科研与教学，激活创作之源。优化评价体系，丰富面向医学院校的科普创作活动、比赛，能够激发师生的创作热情与活力。2023年，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职称评审工作已经开始试点^[9]，或给这一难题的破解带来曙光。

2. 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定位与供给不精确

与新媒体临床医学科普创作相比，新媒体

基础医学科普创作存在着定位模糊、供给不精确的突出问题。临床医学由于其自身的应用科学属性，在科普创作中回应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健康需求。因此，创作者可以根据社会大众关心的热点疾病、公共卫生事件、健康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题材进行创作回应诉求，同时根据社会大众对医学健康问题的不同诉求，对受众进行精确定位，提高科普供给的精准性。创作者还可以在创作前后，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信息采集、反馈机制，与受众形成有效互动，进一步拉近科普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信息、情感交流距离。然而，基础医学由于其自身的基础科学属性，其学科定位是在医学的科研和教育环节发挥“基石”作用。因此，在科普创作中往往扮演了科研成果阐释推广、教学改革方式创新的“辅助者”角色。形成了囿于研究所或校园的“内向式”科普，科普创作“曲高和寡”，面向社会群体的受众不多，且没有很好的定位受众分布，调查并回应受众诉求。在这方面，适当借鉴国内外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新媒体科普创作相对成熟的发展经验，或能给基础医学科普工作者带来启示。

3. 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缺乏创作路径

精准的内容定位能够选出合适的材料，而把琳琅满目的原料加工成盛宴，需要合适的叙事路径作为方法。然而，目前的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叙事路径确实还有很大探索空间，有些是与其他类型的科普创作存在共性的问题。第一，缺乏对科学隐喻的解构和重构。有的作者笔下知识生硬、晦涩，没有形成有利于科普、受众理解的隐喻体系^[10]，使得科普效果大打折扣。第二，缺乏有效的文理交融叙事路径。文理交融是目前科普创作发展的整体趋势，不少作者已逐渐有了这个意识，但一些作者尽管在创作中试图

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融合起来，因缺乏有效的方法，导致文章呈现“油水不兼容”的状态。第三，科学严谨性、科学伦理和科学哲学有所缺失。科学严谨性问题是科普创作共同面临的问题，作品要有科学依据，不能传播假科学、伪科学。但基础医学新媒体科普创作呼唤着更深层次的伦理审视、哲学思考，需要创作者有更多的伦理、哲学思维去判断创作素材，甚至在文中设置相关问题，启发读者进一步研究、思考。

三、从叙事路径探索新媒体时代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优化策略

笔者认为，新媒体时代，要破解基础医学科普创作发展的个性及与临床医学的共性问题，关键在于“以媒为桥”优化科普创作的叙事路径，“以人为本”塑造青年受众与创作者的双重角色。基础医学科普创作要形成自身的创作特色，尤其要在医学与人文结合的叙事医学上下功夫，构建有效的叙事路径，实现以知识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创作跨越，形成有隐喻建构、文理交融、伦理审视、哲学思考的创作道路。探寻有效的新媒体叙事路径，将内容精确供给到青少年，使之成为新媒体时代科普供给端的获益受众和潜在创作者。

笔者立足教学、科研工作需要，长期进行基础医学科普创作，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作品。观察既有新媒体基础医学优秀科普作品并结合个人创作经验，笔者认为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创作的叙事路径有以下五个切入点。

（一）以科学活动人物为主角的叙事路径

笔者作品《这是一篇有故事的 Nature Chemistry：第一作者年仅 7 岁！》的故事主角是一对父女，父亲是一位从事抗癌药物研发的青年

科学家，女儿还在上小学，却不幸罹患儿童癌症。父亲为了让女儿能够扫除癌症带来的心理阴霾，想到了女儿在自己办公室把玩化学球棍模型时，设计了一个她称为“盲鸡”的分子模型。父亲决心把女儿的想法付诸实践，于是，父女同心协力，煞有介事地设计了“盲鸡”分子合成路线，并写成论文投稿发表到著名化学期刊《自然—化学》(Nature Chemistry)上。最后女儿成功地从疾病中痊愈，父亲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突破。这篇文章的特点是以科学活动人物及其家人为主角进行叙事，在叙事过程中不仅阐释了抗癌药物研究、儿童癌症的专业知识，还通过父女在事业、疾病两条线克服困难的隐喻打动了读者，使读者获得了共情体验。

笔者另一篇作品《险些被扔掉的底片，改变了欧洲宇航的历史》则以科学大师作为叙事主角，在宏大的宇宙背景下，展现了人类探索生命起源的不懈努力，这也是生物化学的重要研究命题。文章讲述了两位杰出的乌克兰科学家克里姆·伊万诺维奇·丘留莫夫(Klim Ivanovich Churyumov)和斯维特娜·伊万诺夫娜·格拉西缅科(Svetlana Ivanovna Gerasimenko)青年时代意外发现了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67P 彗星)，35 年后欧洲宇航局以这颗彗星为目标，历时 12 年，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探测器登陆彗星的壮举，并鉴定出彗星表面的一系列有机小分子，为“彗星播撒生命物质”的假说提供了证据。文章以两位科学家的人生片段和欧洲宇航局探测 67P 彗星的过程为两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叙事中透出一股险中求胜、逆流而上的“孤勇者”气概，隐喻了科学家们熠熠生辉的人生如同闪耀于夜空的星星。

（二）以学科跨界交叉为特色的叙事路径

笔者作品《他和她的盛宴，穿越三千四百

年》讲述了一个依靠跨界新技术破解百年考古谜题的故事，一百多年前，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从埃及墓葬中发掘并带回了一批珍贵的密封陶罐文物，这批密封陶罐有 3400 年历史，但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物质。围绕着如何在保护陶罐完整性的前提下探测里面内容物这一难题，考古学家等待了一百年，最终依靠一项原本用于疾病检测的医学分析技术，成功破解了这个“盲盒秘密”。文章在行文中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暗喻在科学研究中有时“欲速则不达”，等待也许是最好的策略，并展示了基础医学与考古学跨界交叉的科学魅力。

笔者另一篇作品《有荧光的饮料，能救命的神药——奎宁的百年传奇》讲述了经典抗疟药物奎宁的百年简史，从有趣的“暗黑”饮料汤力水到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金鸡纳霜，从天然提取物奎宁粉到孟买蓝宝石酒，文章以人类认识、利用奎宁的历史为主线，穿插了人文地理知识、欧洲殖民历史和奎宁化学合成史，在传播奎宁科学知识的同时，凸显出了文理交融、以史为鉴的叙事特色。

（三）以构建隐喻为特色的叙事路径

2022 年“科普中国青年之星”创作比赛获奖作品《细胞保卫战》就是一篇在建构隐喻上颇具特色的文章，文章受科普动画《工作细胞》的启发，以小说体裁、拟人化的方式描写了人类免疫细胞与新冠病毒进行殊死搏斗并最终获胜的过程，在激烈紧张故事情节中有医学免疫学知识的传授，全文形成了两个维度的隐喻建构：第一，解构了基础医学专业知识的隐喻体系，重构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科普隐喻体系；第二，通过拟人化的写作手法，以不惧病毒、舍生忘死的免疫细胞暗喻奋战在疫情抗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四）以科学伦理审视为主题的叙事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在医药研发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引发了“人工智能在医药研发中扮演主角还是配角，这种角色是利还是弊？”的伦理思考。笔者作品《课题做不出来，也有机会发 JACS》就是一篇“反其道而行之”，从“弊”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报忧不报喜”，从一个世界著名的人工智能药物研究团队视角，报道了一例他们所进行的失败案例，即人工智能预测某种小分子化合物合成路线失败，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反思人工智能的短板和不足，以及人的因素在医药研发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这个团队将失败案例发表于著名学术期刊《美国化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的事实，暗喻了重要的科学发现不仅包含证实，也包含证伪，没有一项严谨的实验结果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哪怕是失败案例。

（五）带有哲学思考和升华的叙事路径

笔者作品《Nature 封面：“大道至简”的科学证据》以发表于著名期刊《自然》（Nature）上研究人类思维习惯的一篇论文为素材，分别通过一个乐高玩具模型、一个纸面微型高尔夫球场模型和一套网格电脑游戏测试受众者破解问题的思维方式。这些有趣的测试结果显示，人们在遇到问题时，往往倾向于用“加法”，而非“减法”的方案去破解问题，尽管很多时候“减法”更经济实用。这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大道至简，繁在人心”不谋而合。最后，文章以米开朗基罗的名言“我只不过是从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上凿去多余的石头，留下来的就是大卫”画龙点睛，使得整篇文章在叙事上有了哲学思考和升华。

王立铭的《巡山报告》专栏文章《阿尔茨

海默病研究，到了“范式转移”的关键节点》则是一篇兼具知识性和思想性的基础医学科普佳作。文章紧跟医学科学热点问题，清晰梳理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历史，并引用科学哲学史上两位著名学者——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名言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对这个研究领域遇到的困境进行深度剖析，并对当前这个领域的重要论文造假现象进行科学伦理审视，使得整篇文章不仅仅停留在科普知识的传播上，而提升到了哲学升华的水平。

四、余论

当前的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存在“临床热、基础冷”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媒体医学科普创作的长远发展。为改善这种局面，需要在“大健康”“大科普”理念下，加强科普创作团队建设，构建临床与基础协同发展的医学科普新生态，实现科普创作的跨界交叉，提升新媒体基础医学科普作品的质量。这里提到的交叉，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基础医学的交叉，即在科普创作中，基础医学所涵盖的医学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医学免疫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医学化学等学科，以及与基础医学紧密交叉的生命科学、化学、物理、数学存在向内交叉问题；第二是广义医学的交叉，广义医学涵盖了基础、临床、预防、康复等医学门类，基础医学与其他相关医学学科是存在相互交融的，并不能完全割裂，因此在科普创作中，基础医学与临床、

预防等学科创作者要在收集素材、选题、受众分析、团队建设上相互学习借鉴，深度合作，取长补短，同向而行，实现“大健康”的科普创作模式；第三是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界交叉，从学科上看，这样的跨界交叉，形成了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等文理交融学科，为形成“大科普”式科普创作准备了条件。

提升基础医学创作者的积极性十分有必要。当前，医科院校推进学科建设和教育改革，离不开科研和教学的进步，而各个院校职称评定、绩效分配等激励政策扮演了发展“推手”角色。医科院校可以发挥新媒体科普创作在推动网络育人、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的独特作用，在“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总体布局中，制定科普育人支持项目、第二课堂创新分等激励教师和学生的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发挥特长从事科普教育和创作，学生积极参与科普创作实践活动。学校可以通过科普创作任选课、校园网络科普创作比赛、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等实践活动，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叙事型医学人才，选送优秀作品参加校外科普创作比赛，投稿主流网络科普平台，实现立德树人和服务社会两个目标。校园科普创作者应该对科普与科研和教学的紧密联系有清晰、明确的认知。校园科普创作不能“原地踏步”等政策照顾，需要主动与科研和教学衔接融合，在衔接融合中找到自身繁荣和学校发展相契合的突破口，以期构建新时期学科更齐备、创作更活跃的医学科普创作新生态。

参考文献

- [1] 喻倩. 科普机构微信公众号的科学传播研究 [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22.
- [2] 张敏. 科普类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D].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22.
- [3] 郑颖璠. 国内医院用微信公众号做科普的现状成因 [J]. 新媒体研究, 2016, 2(12): 64-65, 87.

- [4] 郑源, 刘沁. 全媒体背景下公立医院健康科普模式的构建与应用——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科普实践经验为例 [J]. 华西医学, 2022, 37(9): 1365–1370.
- [5] 朱秋艳. 新媒体环境下公立医院健康科普的实践与思考——以北京安定医院为例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2(9): 236–238.
- [6] 李怡青. 健康传播类短视频的叙事研究——以“医路向前巍子”抖音账号为例 [D]. 兰州: 兰州财经大学, 2023.
- [7] 曾文娟. 新媒体语境下医学科普漫画的现状与发展策略——以小大夫漫画、腾讯医典和混知健康为例 [J]. 科普研究, 2022, 17(3): 54–61, 107–108.
- [8] 王子清. 叙事医学视角下医生自媒体的价值引导研究 [D].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22.
- [9] 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EB/OL]. (2023–04–17) [2023–08–29]. https://www.cast.org.cn/xw/tzgg/ZZRC/art/2023/art_4035cfe1c03a45c39bcb706af0b56447.html.
- [10] 王勇安, 李丙南. 科学隐喻与“后真相”时代传统科普出版的价值重构 [J]. 出版广角, 2022(21): 21–26.

(编辑 / 邹 贞 齐 钰)

Exploring Human–Centric and Media–Bridged Narrative Pathways in Basic Medical Science: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rough New Media

Guo Kai¹ Li Yuan²

(Department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¹

(Administ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²

Abstract: The field of new media–based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specially in basic medicine, is rapidly developing. However, compared to clinical medicine, the cre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ontent in basic medicine is relatively scarce. This disparity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significant role and potentia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within the broader medical discipline, and it somewhat hinders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ate of new media–bas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basic medical science, comparing it with that in clinical medicine. It identifies common and unique challenges in both fields. Drawing on personal and others’ experiences, the author explor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new media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basic medicine. This exploration is guided by two principles: using media as a bridge to optimize narrative pathway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adopting a human–centric approach to shape the dual roles of young audiences and creator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limit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bas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basic medicine and offer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energize the creation of such content.

Keywords: basic medicine; new media–bas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narrative pathways

CLC Numbers: G315; R3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957/j.cnki.kpczpl.2023.03.007